



改革网



中国改革报微信

传播力就是竞争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中国改革报社主办

『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看消费新走向

□ 于佳欣 刘红霞

“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这是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表述之一，透露出未来消费发展的新动向。

会议明确提出，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1%，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与发达国家高达80%至90%的消费率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外部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当下，强调深挖内需潜力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巨大潜力在于消费，促消费与我国经济增长由外需驱动转为内需驱动的发展模式相适应，不仅有利于稳内需，也将成为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小广说。

新华社记者近期调研也发现，不少外贸企业通过加强创新，在开拓国内市场中挖到更大“金矿”。而今年报名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企业有3000多家，远超首届，热情的参展商正是为中国巨大的“买买买”潜力而来。

从这组数据或能感受中国消费的力量——

每小时，百姓花费超45亿元用于购物和餐饮消费，快递企业处理超过615万件快件，去年“双11”期间，某电商平台上百家品牌成交额过亿元……

有外媒评价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减少对投资、出口的过度依赖，更注重内需市场，这种转变将使得中国经济面对外部不确定性时更具韧性。

以改革促消费，用改革激活力添动力。

扩内需，促消费一直在做，但这次强调“用改革办法”让人眼前一亮。

尽管6月份消费增速达9.8%，但保持未来高速增长的持续性仍需努力，特别是当前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待优化、社保制度等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因素，制约了消费增长潜力。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扩大消费，与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整体思路一致，即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激发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培育消费增长点。

具体来说，就是从供给端入手，通过为企业减税降费，让其轻装上阵，并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等，让企业有能力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从需求端入手，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保改革等，激发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

以当前多地大力发展的“夜经济”为例，如何解决夜间出行便捷化问题？安全保障措施如何到位？……这些都需要城市管理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会议还对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等补短板工程和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部署。在王小广看来，提高供给效率，关键是提高创新回报率，降低投机回报率，而投资是改善供给的重要方面，应多做补短板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方案》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近日，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海南和有关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实施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支持海南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上大胆创新，着力集聚有志于海南建设和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人才保障。

《实施方案》指出，要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队伍，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平。经过10至15年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与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人才队伍。

《实施方案》强调，要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海南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全过程。有关部委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人才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海南倾斜支持。海南要按照整体推进、分步实施、率先突破、先易后难原则，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推动实施方案落地见效。

丹东：建设沿边开发开放先导区

着力打好“开放牌”，做足“边”文章，释放“海”潜力，激发“江”活力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王军善 王也

辽宁丹东市，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与朝鲜隔江相望，是亚洲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边境口岸、机场、高铁、河港、海港、高速公路的城市，也是祖国18,000公里海岸线的北端起点。

上世纪50年代，一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嘹亮战歌在此发出。作为抗美援朝中最前沿的城市，丹东饱受战火的洗礼，成为了一座可歌可泣的英雄城市。

如今，丹东转身向海，着力打好“开放牌”，做足“边”的文章，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日渐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业、商贸、旅游等为主体的沿海沿江沿边城市。

6月24日，本报“东北振兴辽宁行”采访组走进丹东，在行走中见证这座城市的蝶变。

“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
做优实体经济
培育壮大新动能

丹东素有“银杏之城”的称号，现拥有近40条银杏大道。其中，振兴区九纬路上的百年银杏树最负盛名，享有“金光大道”的美誉。

6月25日一早，采访组从振兴区九纬路出发，途径“金光大道”，看到道路两旁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树，不觉令人由衷赞叹！心想深秋时节一定要再去一次。

经过半小时左右的车程，采访组到达刚搬至丹东新区不久的丹东市发改委，就丹东沿海经济带建设情况进行座谈交流。

丹东市发改委副主任王晓宏告诉采访组，自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丹东充分发挥沿边、沿江、

沿海区位优势，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做优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沿江沿海经济带实现快速发展。

比如，沿海区域发展空间不断拓展，沿岸城市带、产业带和旅游带已经形成；沿海区域投资项目不断增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集群；沿海开放新格局开始形成，产业园区的支撑作用愈发增强。

坐落于丹东市振兴区北环路97号的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一八公司”)，是中国大马力发动机曲轴和模锻件专业生产厂、中国船用发动机曲轴骨干生产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中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鸭绿江1号”就诞生于此。

据五一八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公司产品有300多个品种，覆盖汽车、工程机械、船舶、石油、矿山、铁路、发电机组等领域，锻钢曲轴在国内重型车用曲轴市场占有率居同类企业之首，船机产品基本覆盖中国中速机船机曲轴市场。

走进五一八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派忙碌景象。其中，一个主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展板，吸引了采访组的注意。据介绍，这是毛主席于1958年5月18日在国家计委党组呈报的关于安东机械厂研制拖拉机报告上的题词。

如今，五一八公司瞄准世界一流产品和一流管理水平，继续实施技术改造，逐步实现独立研发，实现生产线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的目标，保持装备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在同行业的领先优势。同时，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东风，积极把自



辽宁丹东市，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与朝鲜隔江相望，是亚洲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边境口岸、机场、高铁、河港、海港、高速公路的城市，也是祖国18,000公里海岸线的北端起点。图为鸭绿江大桥。

本报记者 王军善 摄

主品牌推向世界。

“孔雀飞来不落脚”
确定时间表任务书
重振轻工业名城雄风

“大姑娘，要订婚，‘三转一响’先打问。”这句俗语说的是上世纪7,80年代人们梦寐以求的“四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当时，哪位青年在结婚时能拥有其中的一件，婚礼就算得上很体面了。

就拿手表来说，一如北京表、上海表，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孔雀表也迎来了腾飞。而孔雀表的产地就在丹东。

丹东是中国钟表制造业的发源地之一，钟表工业曾是其优势产业之一。当时，年产380万只手表的辽宁手表厂，年上缴利税1.2亿元，占丹东市

财政收入的1/4。

据介绍，孔雀表当时在北京也很热销，一批新货刚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就被抢售一空，因而有了“孔雀飞来不落脚”的美誉。

走进孔雀表业钟表博物馆，看到陈列着的各种腕表、时钟、机芯等产品，既有1957年生产的“前进”牌手表，也有上世纪6,70年代的“辽宁”牌等手表，还有孔雀陀飞轮手表和全球第一款运动陀飞轮腕表……这里，不仅完整记录了孔雀表业的发展史，而且展现了其传承与创新的魅力。

据孔雀表业品牌管理中心

》2版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成效与经验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 章章舜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差异大，一些生活在资源贫乏、生态脆弱、灾害易发频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难以覆盖等地区的贫困群众，通过传统扶贫手段难以实现就地脱贫，只能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上解决其脱贫发展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经过不断探索，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为我国扶贫开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的历史演进

易地扶贫搬迁是主要针对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实施的专项工程，目的是通过“挪穷窝”“换穷业”，从根本上解决搬迁群众的脱贫发展问题。作为一项中国开放式扶贫的重要举措，易地扶贫搬迁经历了地方探索、试点推广、有计划实施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末，以各地自行探索为主。我国一直是世界减贫

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始终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向减贫脱贫宣战，在扶贫开发方式方面进行积极探索。1983年，我国针对“三西”地区严重干旱缺水与当地群众生存困难的情况，探索实施了“三西吊庄移民”扶贫，帮助当地群众摆脱贫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开启了搬迁扶贫的先河。随后，易地扶贫搬迁成为我国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受到重视并逐步推广。

第二阶段，21世纪初至2015年，以国家层面试点推广为主。2001年，在内蒙古、贵州、云南、宁夏4省(自治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随后又陆续扩大到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了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并逐步增加资金支持总量和人均补助标准，形成了稳定的资金投入渠道。多年实践证明，易地扶贫搬迁成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摆脱贫困的最有效

途径。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示范带动下，陕西、重庆等省市结合当地实际，统筹各方资源，实施生态移民、避灾搬迁等搬迁工程。2001年至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累计安排易地扶贫搬迁中央补助投资363亿元，支持680多万贫困群众完成搬迁。

第三阶段，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以大规模有计划推进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推动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阶段。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五个一批”精准扶贫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各地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工作。根据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数据，2015年全国还有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仍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基于这一现实情况，党中央、国

务院决定用5年时间，把这1000万贫困群众搬迁出来，彻底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就业机会，实现稳定脱贫。2015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拉开了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序幕。

新时期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的主要做法
与成效

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要在5年内搬迁近1000万人，搬迁规模之大、搬迁对象贫困程度之深、工作链条之长、实施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来打造，坚守“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理念，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牢牢把握搬迁对象精准的“界线”、住房面积的“标线”、搬迁不举债的“底线”和资金项目规范管理的“红线”，突出搬迁对象精准识别、安置方式选择和安置区选址、项目建设和工程管理、后续脱贫、拆旧复垦复绿、社区管理和融入“六个环节”，统筹解决人往哪里搬、钱从哪里筹、地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收入如何增、生态如何护、新村(区)如何管等具体问题，推动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有序实施并取得明显成效。

》2版

